论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危机意识的变化

徐　绍　清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日两国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关于甲午战争本身及其前后中日双方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著述甚丰。然而，从更为广阔的历史层面来考察这场战争前后中日民族意识嬗变的著述尚不多见。本文旨在通过对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双方民族危机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总体描述和分析，探讨双方民族危机意识发展变化的原因及其对各自历史进程产生的不同影响。

一

危机意识是相对于不受任何干扰和威胁的自我中心主义、优越、安定的心理意识而言的，是自身生存受到威胁而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近代以来，危机意识的加强是中日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总体说来，远在甲午战争以前，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活动的加剧以及对世界局势认识的加深，两国的危机意识不断加强。

首先，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人危机意识的产生及其明晰化应该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其实，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就有人注意到了海防危机。如1826年经世派代表人物包世臣就断言，英国不久将从海上对中国构成严重危胁。当时，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海防方面的著作，也反映了一些人对于海疆危机的认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证实了他们的远见。之后，中国人的危机意识逐渐明晰化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面前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人的行为是其心理活动的外化，我们从对林则徐的思想和行为的考察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位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在鸦片战争以前，林则徐一直认为英国无茶叶、大黄便无以为命，西人将“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①这时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他没有认识到将要国难临头的民族危机形势，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深刻的民族危机意识。但是，被清廷革职以后北上西行，林则徐的认识深化了。1841年8月，途经京口时，遇老友魏源，林向其倾吐了“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②的忧虑。在洛阳期间，他还感慨地写道：“今虽万里西行，而南望侧身，叹喟欲绝，尚敢希林泉之娱哉”。③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林则徐观山失色，望水黯然！

这一时期对于危机形势认识较为深刻的另一个人就是魏源。他写的《海国图志》、《圣武记》两部著作，主要是基于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而写就的。从1840年到1860年期间，中国至少出现了双部介绍“夷情”的著作。这些著作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深化了。如姚莹提出“希望中国免受耻辱，并且用加强海防和边防的方法，使中国避免被外国征服”。④从林则徐被免职后的忧叹和魏源等人关于“夷情”著作的问世以及姚莹的言论中，都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危机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再从日本方面来看，早在1786年日本著名的海防论者林子平就写出了《三国通览图说》，

主张为了保卫日本，必须确保虾夷、朝鲜和琉球。1791年林子平又写出17卷的《海国兵谈》，强调海防是日本全民族的任务。1797年，大原左金吾刊行《北地危言》，指出"外寇乃天下（指日本）之仇，非仅一国（指一藩）之寇"，⑤也注意到了"北方危机"即来自俄国的威胁。鸦片战争中，邻国中国的失败，使日本人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自身的威胁，由此产生了日渐强烈的危机意识。1843年日本幕末著名的史学家、诗人斋藤竹堂写了《鸦片始末》一书，叙述了鸦片战争从暴发到结束的历史，并加以评论，提醒日本国民应该重视鸦片战争的教训。1849年长山贯写成了《清英战纪》一书，作者在自序中也提醒日本政府要提高警惕，加强海防。他还认为"清国目前讲和不过是暂塞凶食，将来结果如何，恐怕其（指英国）凶焰难以止住"。⑥日向国佐士岛津忠宽在向幕府上书中也忧心忡忡地说："今清国大乱，难保何时涉及日本"。⑦日本人民以及上层统治者对鸦片战争的反映都是很敏锐的。当时总理幕府政务的老中水野忠邦在鸦片战争爆发不久就意识到，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⑧如果说日本人对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是间接地受到很大的刺激的话，那么，1853年美国政府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闯入江户湾制造的"黑船事件"则使日本人受到了直接刺激，这对日本人心理上的影响变更为巨大。维新志士佐久间象山和吉田松阴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在得知日本的海防力量远不及美国军力的强大时，强烈的危机感使他们"终夜难入睡"。⑨足见培理率舰队闯入江户湾对于日本人心理的冲击之强烈。以至于"当时的书信和日记中频频出现的名词就是'履薄冰之思'、'天下之危'、'累卵之危急'……"⑩等等。这些都反映了美国舰队闯入日本以后日本人危机意识的加强。从1786年林子平写出《三国通览图说》和日本人对鸦片战争及美国舰队闯入等事件的反响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对于民族危机的认识不仅要比中国人早，而且要比中国人敏感得多。这种对民族危机认识的程度的差异主要应归因于两国地理、民族及文化方面的不同。

中日两国虽都地处世界东方，但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部，地广人稠，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辽阔。在交通、信息传播不发达的时期，中国人对于各种事物的反响表现得相当迟钝并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一般说来，政治中心京师和东南沿海，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反映比较敏锐，内地的反应则表现出极大的惰性。同时，幅员广大的领土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则容易使人们产生安全感。日本则不同，它是孤立于万倾波涛之中的海上岛国。国土小，自然资源也很匮乏。这种狭小的生存空间和缺乏自然资源的地理环境，使日本人在自我意识方面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如遇到外部因素的威胁，这种敏感的危机意识就会更加强烈。而且，国小，信息传播较快，使得日本人对于各种事物的反映表现出极大的统一性。

从民族因素来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的多元化使中国人对外界事物的反映很难一致。日本民族的相对单一性，则使其对外部威胁带来的危机意识表现出相当大的统一性和平衡性。

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中日两国危机意识差别的重要因素。古代中国在历史上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这一文明就给中国人的心理上带来了巨大影响。历史上中国人的自我中心、优越意识就是其文明成果的副产品，而优越意识在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也滋生了中国人的大国主义和安全心理。在这一心性的驱使下，对外界事物的反应则表现出极大的惰性。而且，由于受到优越意识的种种制约，危机意识被不断地"内耗"，从而被大大地淡化了。日本则不同，其古代文明是中国文明辐射的产物，没有文明的包袱也成为日本人对外界事物极为敏感

的主要原因。古代日本始终以相当悬殊的文化落差比邻于中国，文化上的自卑感使得日本人对于历史上象元朝东征日本那样以强凌弱的事件始终耿耿于怀。因此，日本人从古代起就有来自中国的压力。到了近代，由于面临着西方侵略势力东渐而形成了日益强烈的危机意识。由于地理、人文、历史上的诸多原因使日本各阶层对民族危机反应都很敏感。幕末“攘夷”、“开国”之间冲突甚烈，但对外来危机的认识却是基本一致的。

上述可以看出，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和制约，不仅影响着中日双方对于危机形势的认识，而且也影响着双方危机意识的深化和发展。

尽管由于许多因素的存在和制约，使得中国人的危机意识被淡化，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还是使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增强了。这次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林则徐所担心的“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的局面，而且出现了边疆危机。客观条件的变化是人们心理变化的基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后来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优越意识——这一由悠久历史、辉煌的过去所铸就的心理板块再一次以强烈的冲击。冯桂芬就是这一时期受到这种冲击而产生强烈的危机感的中国人之一。他在 1861 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就预言：“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⑪对于危机形势的认识是近代中国人采取应变世界压力行动的心理驱动力。由于危机意识的日渐增强，促使林则徐、魏源的后继者们将他们先驱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救国方策，在二十年之后付诸于行动，这就是洋务运动。如果说洋务运动中所建立的军工企业除了具有防御外敌入侵之目的而且还具有对内镇压农民起义之企图的话，那么洋务运动中创建的海军则无可置疑地是基于对外来危机的考虑。这一点李鸿章在同治年间呈请清廷《复奏海防事宜疏》中已作了说明。他奏称：西方“各国传教……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構煽……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械机器之精，巧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⑫应该说李鸿章确实看到了西方近代化的威力。因而他强调：“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力，故能横行于中国；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⑬因此，他反对停办福建的造船厂，他要用“现代化”的武器来摆脱危机。对铁路建设的态度也反映了他对边疆危机的认识。1872 年他在复丁雨生的信中强调铁路益处主要在国防方面，而且直接目标在西北的防御，“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守之方”。⑭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面临危机四伏的历史时期，这得使更多的中国人不能不对现实的危机做出反映。左宗棠原想“气病还湘”，但在沙俄侵占黑龙江以东地区后，他看到了新疆形势的危机，便认为“断难遽萌退志”。⑮

以上情况可以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侵略，对中国人危机意识的日益增强起着外部的推动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对西方的深入了解则是唤起危机意识的内在动因。这种对西方的了解也包括未曾出过洋的人。如曾历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等职的张树声，他是李鸿章的亲信，虽未曾出过洋，但通过办洋务对西方有了一些了解，在临死前口授的《遗折》中写道：“今台湾告急，援济无方，窃虑琼州将踵共后，若敌得志，台琼祸患殷殷何可推测”。⑯其危机意识，跃然昭目。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危机意识，他才主张一旦战争缓和，就当“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⑰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思想上由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到学习其制度的转变。但是，以优越意识为心理基础的守旧势力，他们的行为总是制约着中国人对于危机形势的认识，并竭力阻止任何人因危机感而产生的思变行为的发生。大学士倭仁反对在京师开设同文馆的奏疏颇为典型。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今求一技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

未闻者有恃术而起衰振弱者"。⑱这种思想及言论，影响了更多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而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又使得中国人的危机意识的加强受到多方的影响。本来，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凌的过程中不断加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侵略是中国人危机意识加强的后推力。但是，中国人反对外来侵略战争的失败，尤其是中法战争中马尾海战的失败，预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师夷"未能"制夷"，这又为优越意识的膨胀提供了口实。历史的复杂性使中国人危机意识的加强和优越、安全意识减弱都很艰难。但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甲午战争前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和安全优越意识发展的总体趋向来看，前者仍是逐渐加强，而后者则是缓慢削弱的。

正当中国人的危机意识被优越安全意识羁绊而步履蹒跚的时候，日本人的民族危机意识却迅速地增强了。虽然欧美国家在迫使日本开国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武装冲突，但是，1858年后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却给日本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外国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日本享有各种非法特权，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半殖民地化的危机，激化了日本民族与列强的矛盾。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以中下级武士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主体力量的一批爱国志士率先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斗争。如同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人的抗英斗争一样，在早期，日本人摆脱危机的行为也仅仅是一种避害的行为，对危机形势的认识亦没有上升到应有的高度。1860 年 3 月的"樱田门事件"，日本的草莽志士们刺死了因代表日本幕府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而被他们认为是引狼入室给日本带来危机的祸手井伊直弼就说明了这一点。接之而来的大规模的"攘夷"运动更加证明了日本人对危机形势的认识远没有上升到用文明尺度来衡量的高度。直到美、法、英等国的舰队对"攘夷"进行了严厉的报复行动，并通过 1863 年 9 月的"第二次下关战争"，迫使长州藩与之签订《下关协定》，日本的有识之士才清楚地认识到：在同西方国家武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进行"攘夷"，是不能摆脱危机的。"攘夷"的失败使日本志士将日本与西方文明进行了总体比较，寻找到了"开国进取"，以西方文明为价值尺度的"内治"摆脱危机的道路。可以说，是鲜血使日本有识之士完成了思想认识上的转变。而认识的转变又是行为转变的前提。也正是基于对两种文明制度的认识而产生的危机感，使日本志士迅速完成了倒幕维新的历史变革。又由于对民族危机的深刻认识，日本政府才加速了三大政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进行。

1871 年 12 月，岩仓使团的出访使他们在日本与西方的比较中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明治政府派遣岩仓使团出使欧美各国，尽管修改解决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没有达到，使他们"唯有饮泣而已"，⑲但思想认识上收获的意义却是长远的。游历欧美诸国使他们"目睹彼国数百年来收获积蓄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⑳他们更加感到日本落后，痛觉因日本文明开化太晚，与欧美有着极大的差距。在"开化最盛"国家的巨大"文明重压"之下危机意识更加强烈了。大久保在英国考察时说："亲到西洋一看，深感我等确实不适应如此进步之世界！"㉑在当时日本政府之中，大久保是最为进步最具魄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发生如此感叹，深刻地反映了岩仓使团乃至日本政府一旦清醒地看到与西方文明的差距时所引起的震惊和产生的深沉的民族危机感。最后，通过考察，岩仓使团的成员更加明确了日本目前的危机是由欧美和日本双方文明反差所造成的。如何缩小这种反差，使"日本也将与世界文明国度为伍呢？"在对世界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的基础上，岩仓使团回国后选择了内治以自强的道路。结果，以岩仓使团为首的内治派战胜了力主先"征韩"的西乡隆盛一派，他们的一切主张得到了实施。

如果说在中日危机意识产生及发展的初期，日本人对于危机形势的认识要比中国人敏感的话，那么，在这一时期日本人的民族危机意识要比中国人深刻得多。其深刻性表现在日本大多数人，更重要的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人能够认识到目前的危机是两种文明制度的差异造成的。认识的深刻性决定了选择摆脱危机道路的准确性。从而使日本得以迅速实现近代化，摆脱了民族危机。中国则不同，这一时期，中国虽然也认识到了危机形势，并采取了摆脱危机的措施，如洋务运动。中国也不乏有识之士对西方近代文明有了整体的认识，并提出了走近代化道路以避免危机加深的设想。但是，中国的要害在于，对民族危机有了深刻认识的有识之士没能将这种认识付诸于行动。并且从整个中国来说，这些有识之士的呼声又显得十分微弱。与日本相比，中国人由于传统的优越安全意识的存在，使民族危机意识在不断增强的过程中承受了巨大的“内耗”，危机意识形成以后经过优越安全意识的过滤而被大大地淡化了。而掌握国家权力的封建统治者对危机的认识程度又根本无法同日本相比。

如果说，在世界历史上，日本只是汪洋中的一叶小舟的话，那么，中国则可形容为一艘巨轮。这艘巨轮在驶进“近代大海”的过程中不断触礁、搁浅，这使它的驾驶者也随之产生了倾覆的危机感。但是，过去的辉煌业绩使它的成员相信：它仍能以旧的身驱继续开拓未来。直到在遭到了更大的撞击之后，人们才试图考虑对它的更换。这种更大的撞击就是甲午战争。

二

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的危机意识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战后中国人的危机意识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心理的变化是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换取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致了惨重的失败，日本“蕞尔岛国”将一直自居东方文明中心的“大国”推到了耻辱的地位。战争摧毁了中国人尚存的优越安全心理意识的基础，更多的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国情和在世界中的方位，中华民族开始了真正的觉醒。梁启超认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二百兆以后始也”。㉒辛亥革命老人吴玉章回忆说：“我还得记甲午战争的消息传到我家乡时，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苦不止……”㉓民族的惨祸加剧了中国人的危机感。由此引发的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是康有为等千余名学生上书皇帝，请求变法的心理动因。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多人联名上书，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他们指出了当前的危机形势：割让台湾是列强瓜分中国的信号，亡国危机迫在眉睫，“诸国知吾专以保都畿为事皆将阳为恐吓都畿，而阴窥边省，其来必速”。㉔康有为还在《强学会序言》中指出：中国的局势是处于“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㉕中国同胞正在“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未有之奇变”。㉖在《南学会序》中，梁启超更是痛心疾首，认为中国已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上。“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源不知谁氏之鬼”。㉗我们从康有为上清帝书的情况的分析中，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这次战争之后中国人危机意识的变化。早在甲午战争之前的 1888 年，康有为就“为国事危蹙”而奋起上书清朝皇帝。这说明康有为作为一代思想先驱，以其敏锐的目光较早地认识到了民族危机的存在。甲午战后，自 1895 年至 1898 年的三年间他又连续 6 次上书，每次上书都是力陈当前国家危局，建议采取措施予以防范，反映了康有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面临国难而产生的深切强烈的危机感。而战后上书的

连续性则反映了他对危机形势刻不容缓的认识。恩格曾说过：历史人物总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固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到的”。㉘康有为正是当时中国风云激荡的时代的思想代表者，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甲午战后，与危机意识加强的同时，就是更多的中国人产生了民族危机感。可以说，甲午战后中国人民危机意识的加强具有全民族的意义。

战后，民族危机意识加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一般说来，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最敏锐、最先进的群体。但甲午战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总体来看，危机感不深，这种情况和日本对化构成了鲜明的反差。出现这种现象的因由恐怕与中国知识分子受到科举制的束缚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科举制对于选拨少数社会精粹，不分等级地位使一些人走上政治舞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条路毕竟太窄了，且八股取士，内容陈旧，知识畸形。这便极大地禁锢了知识分子的头脑，使他们麻木于天下事。这就造成本应是先进群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外来危机的冲击下，没能广泛地觉醒，直到甲午战争后这种局面才发生较大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普遍地走向觉醒。以“公车上书”为中国知识分子觉醒的重要标志，甲午战后各种学会纷纷建立，其主体力量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觉醒还表现在甲午战后中国报纸的宣传方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说：“我国人民之发表政论，盖自此始”。㉙作为革新激进主义者的谭嗣同，他的转变也是在甲午战败之后。他在给其老师的信中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得其要领，经此痛巨创深，乃使摒弃一切，专精致思”。㉚

甲午战败对统治阶层的震动也是很大的。张謇在得知《马关条约》已经签订的那个晚上，在日记中逐条地记下“和约十款”的主要内容，并且注明：“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㉛统治阶层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守旧势力在现实面前也不得不允许“百日维新”的进行。“百日维新”是现实民族危机的产物，尽管它只存在了 103 天便被旧势力扼杀了，但它的推行标明甲午战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把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变为摆脱危机的实际行动。尽管他们的实践失败了，但他的实践充分地反映了甲午战后中国人危机意识的巨大变化。首先，与战前相比，更多的人产生了民族危机意识，这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为主要标志。其次，与甲午战前相比，摆脱 危机的手段发生了变化。战前，中国人摆脱危机的手段总的说来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随着战后认识的深刻化，摆脱危机的手段与过去已有明显不同，那就是以近代文明为尺度，开始了对封建制度进行变革的尝试，“百日维新”就是这种尝试的重要标志。总之，甲午战后中国各阶层对民族危机的形势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这可以从战后中国形成了学习西方、学习日本的社会风气中得到证明。欧榘甲描述当时的情景为：举国士民“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言时务，谈西学”就是由于危机意识的加强而欲挽救民族危亡的举动。

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如果说，甲午战前日本人所感到的国际压力还包括中国的话，那么，甲午战后，日本则将东方“大国”中国的压力剔除得荡然无存。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向世界昭示了自己的实力，长期以来胁迫日本人的危机意识由于胜利而得以舒缓。甲午战后，日本人沉醉于对中国的胜利之中，反映了日本人已经开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和自豪感。

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使日本国内一片欢腾，“岛根”仿佛都震动了。当时年仅几周岁

的生方敏郎后来在《明台大正见闻史》中回忆道：攻占平壤的消息传来后，正在“工作的男子高兴地停止了工作，扫地的妇女兴奋地扔掉了手中的笤帚，孩子们高兴地叫喊，妇女老人掉下热泪”。㉜陆奥宗光当时任外相，他在《蹇蹇录》中描述到：“一般气象因雄心快意而狂喜，流于骄傲自满，国民到处沉醉于欢呼的凯歌声里，未来的欲望日益增长，全体国民……除催促前进的战斗的呼声之外，其他都听不进去了”。㉝甲午战争胜利的消息对日本人的震动何以如此巨大？原因在于：甲午战前国际局势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使日本人形成了一种塌天之祸即在眼前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由于战胜中国而得以舒缓，继而使国民“陶醉于对朝鲜和中国的胜利的民族优越者的欢喜之中”。

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认识到国际压力没有除掉。《马关条约》中的强加给中国的苛刻条件，影响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在割让辽东半岛的问题上对日本同沙俄的野心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于是沙俄纠合法德两国共同对日本实行联合干涉。最后，日本对三国妥协，迫使清政府加付三千万两“赎金”，“赎还”了辽东半岛。“还辽”对日本的触动是很大的。伊藤正德在《新闻五十年史》中写道：“二十八年五月三十日，当国民读了关于归还辽东半岛的诏敕后，除了流下悲愤的泪水之外，没有任何办法”。㉞但是，日本民族有着顽强的性格，这种性格不论是在进步事业还是在反动行动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面对没有摆脱的世界压力，“‘卧薪尝胆’四个字应时而生。‘卧薪尝胆’四个字出现在所在的报纸社论中。悲愤之情寄托在四个字中，继续充实国力的决心，也深深地铭刻于日本人的心中。三国干涉的事情甚至打动了少男少女的天真之心”。㉟而卧薪尝胆的具体行动就是军备扩张。经历十年的“卧薪尝胆”，日俄战争的胜利终于使日本从世界压力下解脱出来，长期胁迫日本人的危机感经过一个起伏阶段后，以《朴次茅斯条约》的签定而最终消失了。这一过程正象日本学者野村浩一所概括的那样：“日清战争（甲午）、北清事变（出兵义和团）、日英同盟、日俄战争贯穿于明治时代的后半期，牢固地确定了日本在东亚外交舞台的地位。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了亚洲的大国中国，通过日俄战争打败了欧洲强国俄国；使日本终于从幕末以来的危机感中解脱出来”。㊱

综上所述，以甲午战争为界，中日双方的危机意识确实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战前，中国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远没有日本人敏锐和深刻。结果导致了各不相同的摆脱危机的方法和手段。战后，中国由于战争的失败，中华民族开始了真正的觉醒，中国人危机意识的加强具有了全民族的意义。与此同时，摆脱危机的方法和手段也与战前不同；即不再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而是试图从制度上加以变更。尽管由于中国的国情等诸多因素而使这种变更归于失败，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却从此大大加强了。而日本由于战争的胜利却开始走向危机意识的反面，即产生了安全意识和自豪感。尽管由于“还辽”事件又使之重新感到危机的压力，但十年后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又使其将危机感抛掷殆尽，代之而起的优越意识弥漫日本全国。直至二次大战结束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无不同这种优越意识有关。

探索甲午战争前后中日两国民族危机意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不难看出，一个民族在面临内外因素压力的情况下，通过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层次上进行研究对比，来审视认识自身的价值，确定自己存在的方位，由此而产生的危机意识是民族奋发、进取、自强的强大内在驱动力。反之，如果满足于民族历史上宏富辉煌的业绩，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就会陷入一种安全优越意识中而不能自拔。中日两国历史上由此而出现的由弱变强和由盛转衰的教训给了

我们极为深刻的启示。

---

①《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1页。

②杨国桢：《林则徐传》第348页。

③《云左山房文钞》卷一。

④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985年版，下卷第173页。

⑤〔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上册，第44页。

⑥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启示录》1987年版第16－17页。

⑦《大日本古文书》(幕末外国关系文书之一)，第846页。

⑧〔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178页。

⑨〔日〕鹿野正直：《福泽谕吉》中译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0页。

⑩〔日〕绵贯哲雄：《维新与革命》1973年版第194页。

⑪《校邠庐抗议》卷下，第44页。

⑫《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四。

⑬⑭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25页。

⑮《左文襄全集·书牍》卷一。

⑯⑰《张靖达公奏议》卷八。

⑱转引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1986年版，第86页。

⑲㉑汤重南：《岩仓使团出使欧美》载《世界历史》1985年第8期，第56，58页。

⑳〔日〕山西四郎、远山茂树：《明治国家的权力与思想》，吉川弘文馆，1979年版，第158页。

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戊戌政变记》第249页。

㉓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页。

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公车上书》第132页。

㉕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强学会叙》，第384页，407页。

㉗梁启超：《南学会序》，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二》。

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6年版，第343、344页。

㉙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13页。

㉚《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

㉛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页。

㉜〔日〕宇野俊一：《日本的历史》(26)，小学馆，1976年版，第18页。

㉝〔日〕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一卷，第123页。

㉞㉟〔日〕伊藤正德：《新闻五十年史》，鳟书房，1943年版，第151页。

㊱〔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1981年版，第6页。